

教材是馍，导读就是那泡馍的汤

凤梨

《如何阅读〈红星照耀中国〉》不算难读，一共才126页。但是，前半部的信息太熟悉了，熟悉得我几乎睡着了；到了后半部，才让人打起了精神，因为看到了新鲜的东西。

这本书属于“新课标整本书阅读”从书中的一种。编者之一是北京景山学校的孟岳老师。他希望我给这本书写一点评论。我一时不知道该怎样评论一本教辅读物，于是我要求孟老师，再加上一名参与本书写作的初二学生刘孟涵，一起做一对话。

借用微信群的线上对话还在热场的阶段，刘同学就出了状况——她说话都是一个词儿一个词儿往外蹦。她解释说，这是因为她的手机出了毛病，充不上电，所以她只好用IPAD打字。孟老师惊讶地问她，为什么不电脑打字。她说“电脑妈妈在用”。可能是为了安慰我们，刘同学表示其实她用手机更快，“因为电脑我不会盲打”。这个细节，似乎也是一种代际的隐喻。算了算，我，孟老师，刘同学，正好年龄差都是16岁。

“既然非吃不可，为什么不把它做得好吃易消化一点呢？”

为了让对话有一条清晰的线路，我先整理了四个问题：

- （1）为什么这本书是经典？
- （2）中学生有没有必要读经典？
- （3）中学生读经典需要导读吗？
- （4）中学生读经典需要怎样的导读？

刘同学认可了这四个问题，但提出（2）和（1）应该对调一下，但她似乎没有太大兴趣谈“中学生有没有必要读经典”，她说：

“如果不是教材里有，考试要考的话，我自己应该不会去读教材上那些名著吧，因为就算从我出生到现在一本书也不读，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，我也活得好好的。如果不是要考的话，还不如多背两篇古文或者英语单词。读名著也是应试教育，没办法。”

孟老师对此表示同意，认为这是中学生普遍的心态：“如果名著不考试，背古文和单词的排位要在读名著之前。”但是名著阅读成为应考的一部分，情况就变得不同了。

孟岳正在带着学生读《儒林外史》，他和学生对其中一个情节印象很深：明清科举考中的人，像范进这样的，压根儿没听说过苏轼，但没听说过苏轼并不妨碍他通过考试。“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古今相同”。《儒林外史》里也写了一个精通诗词歌赋的考生被主考官周进骂了个狗血淋头：“当今天子重文章，足下何须讲汉唐！”像你做童生的人，只该用心做文章，那些杂览，学他做甚么！结果这位考生就被赶出了考场。

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我在“简说中国人”那门课里提到过这种考试与名著的关系：比如，唐朝诗人杜甫的声名从远不如同时代的李白，到不断增长直至超越古今所有诗人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杜诗格律严谨，成为科举试帖诗的典范，因此杜甫的诗集成为应试畅销书。而范进们不知道的苏轼，在宋朝是不可能被考生忽略的，因为当时的考

试口决里有“苏文熟，吃羊肉；苏文生，吃菜羹”的警示。而明清以降，所有的诗词歌赋不受考生重视，与农民出身的明太祖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与设计有关。这位将来六百多年考试制度的总设计师，对精英官僚集团有着天然的怀疑与警惕，他更希望选拔底层出身的官员，也热衷于对思想的控制。在这种设计思想的引导下，明清科举考试的考生没有必要，甚至最好不要诵读战国之后的任何作品，除了朱熹等人对经典的注释。多读书不仅会造成文风“拟古”的不纯粹，也容易让八股文里混入不够主流的思想。从应试的角度来说，范进和周进的做法才是对的。如果范进知道苏轼，他很可能中不了举当了官。

当谈到怎样说服学生读经典时，孟老师表示有很多说法可以用，比如文化素养的建立，比如认识世界和自我等等，但都“不太有效”。他觉得比较有效的方式还是直接把经典阅读的活力呈现出来，“说白了就是在导读的过程中，直接把学生勾引过来，而不是啰嗦为什么要读”。

在我看来，考试为什么要考名著阅读，其实是为了提供一条强迫学生阅读的捷径。虽然每个时代定义的经典名著并不相同，但是几乎都代表着选择者对人类智慧的共识。教育本身意味着强加的权力，如果说教育是把（教育者认为的）好东西端给你，考试就是逼着你吃下去。“既然非吃不可，为什么不把它做得好吃易消化一点呢？”

对此刘同学也表示了认同。她仍然坚持如果不考名著阅读，根本不会有中学生去读名著，更不要说名著导读了——事实上，在参加《如何阅读〈红星照耀中国〉》的编写之前，她都不知道有“导读”这种东西的存在。在被逼着读完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之后，刘同学承认“还挺有趣的”，但这一类历史书仍然比《儒林外史》这样的小说枯燥多了——这似乎也能印证“名著必须强迫阅读”的观点。而“导读”，似乎像是卡布奇诺里和咖啡苦涩的奶泡，“能让你看得更好，让你了解更多，让你懂得更通透”。

我开玩笑说，教材与考试是硬泡，导读书就是软磨，如果教材中的名著阅读是一封最后通牒，导读书就是“江南三月，莺飞草长”那样柔情的“劝降书”。

“不只是‘劝降书’，它还是一把钥匙”

显然，孟老师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心血被说成跟着教材亦步亦趋的“劝降书”，“导读书可能在一个前提下有意义，也就是承认读教材里认定的这些名著是具有两个看似相悖的价值的：一个是应试的价值，另一个是这些经典著作本身具有价值，而这些价值需要被揭示出来。”所以导读书不光是“劝降书”，还应该是一把钥匙：“‘劝降书’指向顺应应试，钥匙则指向对这本书自身价值的揭示。就是如果一个学生想要具备一套阅读素养，这一系列名著读下来，有一个导读，就能有帮助。这样看，即使我们不考虑应试，导读书也是必要的，这个导读是帮你建立一套阅读系统，包括方法与视野……好的导读书有助于应试，但会超越应试呈

“当谈到怎样说服学生读经典时，孟老师表示有很多说法可以用，比如文化素养的建立，比如认识世界和自我等等，但都“不太有效”。他觉得比较有效的方式还是直接把经典名著的活力呈现出来，“说白了就是在导读的过程中，直接把学生勾引过来，而不是啰嗦为什么要读”。

现更丰富的东西。”

我感觉孟老师应该是有所准备的，接下来他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“价值”：这本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写于1936年，初版于1937年的著作，八十多年既是一本世界性的畅销书，也同样成为新闻写作的经典之作：

一是它是一本了解红色中国的书，二是它是一本了解“非虚构”或者说纪实写作的书，三是它是一本斯诺的成长之书。其实第一点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的国家，很多当下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需要追溯到延安时代来理解。第二点是读写结合的抉择，斯诺刚开始其实就是来玩儿的，被报社上司要求写写粉饰报道，忽悠外国人来中国旅游和消费，但接触现实之后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。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这书出来以后也连带着让很多外国年轻人、中国年轻人有了新的抉择。

我发现，在微信群里看别人一、二、三点地表述，是一件有点让人头疼的事。于是我要求孟岳把他的观点浓缩成一句话，于是孟老师选择了“对‘纪实’力量的认识”。

而对于初二的刘孟涵同学来说，她阅读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最大的收获是对历史人物印象的改观：“比如说毛泽东这些领导人当年的神采，很少有书能写出这种神韵。这些是我读的时候觉得最有兴趣的，也是读得最上瘾的，因为除了各种我姥姥姥爷跟我说的伟人故事（什么在闹市里面读书训练注意力之类的），这些是我真正自己了解他们的开始。”

对于我来说，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与现代文学的必读之作。然而一本书被称为经典，它必定有多重面相，这些面相显然不可能让读者在中学时代就打捞干净，因此，找准并点明阅读的方向，一方面让学生迅速把握书的筋骨脉络，另一方面点出最容易被学校语文教育忽略的那部分光彩，也就是不同作者进行名著阅读指导的个

性化选择。

站在虚拟的中学生立场，我想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最大的好处，是可以帮助学生认知“新闻纪实”的伦理。新闻纪实的伦理，有两个方面，一是你要让人相信你写的是真实的。斯诺在叙述时把“我”放进去，以及种种的描述与分析，都是为了表明这一点——不管是不是真的客观，一定要让读者相信你的客观性。第二个方面，就是非虚构写作者，也必须要让故事吸引人：从出发点说，你要解决读者关心的问题，比如“红色中国究竟是怎样的”“他们的领导人真的像恶魔一样吗”；从呈现效果说，作者要提供一种可亲近又曲折动人的叙事。所以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实践了新闻写作的要旨，而在当下这样一个自媒体时代，这几乎是每个愿意讲故事的人必备的技能。

一句话，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可以教会中学生讲好一个非虚构的故事。当然也有别的著作能做到这一点，但选入“名著”行列的书，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无疑是最合适的。

亮点在于“谱系”与“共读”

《如何阅读〈红星照耀中国〉》的前半部之所以让人疲惫，因为第一部分“作品概观”与第二部分“整体梳理”都充满了“知识”。诸如《版本讨论》《文学价值》《作者故事》《跨界阅读》这样的章节，以及对人物塑造，情节与视角，环境、价值与意义的讨论，都有着浓厚的教材气息。中学生为什么要花钱买另外一本教材并且阅读它呢？这确实是让人迷惑的问题。就像刘同学提出的问题：“如果导读书和原书都看完之后却不能帮读者打开更开阔的视野，或者了解你们说的读书系统呢？”对此孟老师的回答是“那就是比较糟的导读吧”。

拯救了《如何阅读〈红星照耀中国〉》的，可能是它的第三部分“研读指导”。这一部分由三节组成，第一节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形容为“三副面孔”，实际上引导读者从“新闻特写”“历史记述”“游记寻访”三条途径去理解原著——虽然也有面面俱到之嫌，不过至少简明地点出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多重面相。

刘孟涵同学代表消费者，将消费心态表达得很清楚：“怎么能让我把原著看得懂得更多一点，看得简单一点。因为可以肯定来买这本书的人都是抱着这个想法来的，大家时间都不多，肯定要读到干货，否则反而增添了阅读的时间成本。”对她来说，最有意思的部分是第二节《有创意的写作——化名著阅读为写作资源》：“我能从这本书上面看到其他人对这本书的评价，其他人跟我的年龄都相仿，比如对封面的点评，这样的共读平台，可以互相启发的氛围特别好。”

写作的实践，尤其是同龄人的实践，是最容易拉近书本与读者距离的方式。这就是“共读”的魅力，而共读又不能是同水平的重复与取暖，因此共读议题的设置也是成败的关键。《如何阅读〈红星照耀中国〉》的“共读”部分设计了三种方式：

- （一）参与的中学生读者根据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内容，设计出从西安到延安的旅游路线；
- （二）跟着斯诺学非虚构写作：斯诺活泼的笔调是打破枯燥制式写作的一剂良药，中学生读者选取《红星照耀中国》里的照片，根据照片自己写作一段故事；
- （三）编者找来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各个时期的版本，让中学生读者去解读、评点各版封面的特点与隐含喻义。

这就将单纯枯燥的阅读扩大为了可以动手实践的“走读”与“仿写”，读者也可以拿着这本书，去将斯诺之路走上一遍，体会这位美国人当年的异域感受，如果把旅游路线和照片想象结合起来，就多少能起到“回到历史现场”的作用。我这几年组织读书会，一直鼓吹“万语千言，不如一见”，有没有现场感受，对于理解一部作品，带来的增益不是一星半点。

我特别赞赏对不同版本封面的解读，它同样也带来一种实体感，而不只是虚幻的“经典”，同时也让共读的同学认识到不同时代对这本书不同侧重点的强调。刘孟涵同学在解读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第一个中文版《外国作者西北印象记》封面，对于封面选择了斯诺记录的“统一战线舞”，她的观感是：

这些妇女的笑容，给人一种“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坚持下去”的勇气。看到她们粗糙的面庞，黝黑的皮肤，脸上发自内心的笑容，我也觉得开心……建设红军团社的目的绝不可能只是让大家欣赏节目，对于没有读过书的农民们来说，这是调动起他们抗日精神的最好的方式之一。只有调动起无数的农民的抗日精神，抗日才有可能成功。

可以看出，这不是教师或教材给她灌输的理念，而是她自己解读出的历史细节，这些细节，可能将会成为刘同学理解历史的一种思路。无论赞成与否，这种思考都是教育的成效。

第三节《看到一本书背后的一系列书》，涉及鲁迅编、斯诺译《活的中国》，《中国的西北角》《北行漫记》等同类“红色中国”报道，还有马可·波罗以来，西方人的中国观察，也做了简明扼要的提点。这是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一书涉及的方方面面都呈现于读者面前，也就是尽可能广泛地提供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产生的“语境”，可以让人理解经典是如何形成的：经典是在一层一层、一代一代的接受与传播中，层层累积而成。“语境比文本更重要”的理念，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告知中学生读者，奠定他们的历史观。

所以我和孟老师认为，《如何阅读〈红星照耀中国〉》前面的知识部分，更像是给教师准备的教学参考书，中学生读者感兴趣的拓广与实践，其实集中在第三部分。如果老师拿这本书作为教学参考，可以从前往后谈，如果是帮助中学生阅读名著，那不妨考虑从后往前翻。

回头看孟岳说的“应试价值与名著本身价值的揭示”，其实完全可以合二为一：指明了经典名著的价值，提供了实践与共读的可能，才能让学生有阅读名著的动力。再打个比方：考试是硬仗，导读是一碗撒满葱花与芫荽的热腾腾的羊肉汤。硬仗能撑一天，但是粗食不好咽。羊肉泡馍则人人爱吃，从延安到西安，都是待客的佳肴。

书话

刘选国

接连读了两本陈胜利先生宋史的著作，一本是称为白话宋史，述三百年兴衰的《弱宋：造极之世》，通过一篇篇短文对文人墨客、文臣武将、帝王皇后生平事迹的描述，串起一个宋代历史画卷。另一本则是以大历史观纵论变法成败、于细密之处书写人格精神的《当改革遇见王安石》，以新时代视野反思九百多年前的王安石变法。

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和主要内容

中国封建王朝变法最著名的有商鞅变法、王安石变法、张居正变法，其中王安石变法评价褒贬差异最大。贬之者认为靖康之耻祸因要追溯到王安石变法，褒之者认为“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，惟公庶足以当之矣”。

那么，王安石变法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变法内容有哪些？书中通过十几个独立篇章为我们展开描述。“为用兵找钱”，是王安石变法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，因此，变法以财经改革为核心，辅之以军事、科举改革，构成了变法的“三驾马车”。从“新君的困境”描述宋神宗面对严峻的辽、夏外患和国库空缺的内忧，到“王安石两上改革书”“治州县，不为俗吏”，描述王安石如何通过任职基层，积攒为政经验，并通过上书，在朝野树立良好的个人威望，被多位资深官员举荐。而“当改革之君遇见改革之臣”一节所述，宋神宗这个希望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，与有志于革除朝政弊端的王安石，在“延和殿一锤定音”，终于达成共识，于是王安石走上变法的前台，策划并推出了系列改革新政。“商业的改革”推出了均输法、市易法、免行法，“助农之法”推出了青苗法、农田水利法、免役法、方田均税法，军事改革推行将兵法、保甲法、军器监法、保马法，还有科举制度改革。

“王安石变法创举之多，领域之广，前所未有。”书中对每一种新法的历史渊源，新法改革针对革除的弊端，新法推出后取得的成效，都做了详述。改革遭遇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大，尽管王安石坚硬如磐石，推进不动摇，也因此得罪了众多皇亲国戚、师长朋友，树立了一大批政敌。而神宗虽然自始至终支持王安石变法，但也有过动摇和妥

“若放眼世界，自十四世纪以来，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三百年后的种种变革，王安石变法体现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方位感与方向性，与数百年后乃至当今追求变革的时代精神、世界潮流不谋而合

►南京王安石故居（即半山寺）。北宋宰相、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失败后，就居住在这里。

新华社资料片（摄影：高梅及）

协，以致王安石两次被罢相。晚年王安石尽管仍然受封舒国公、荆国公的殊荣，但他经历了神宗两次征讨西夏的败绩，感知了他曾经推动的改革在神宗去世后，逐一被高太后和司马光废除殆尽的痛苦。

王安石变法的成效和功过

王安石变法成效到底如何呢？书中二十七节“宋朝几乎要振兴了”，作者进行了概括性评述：首先看富国，财政增收目标实现了。“熙宁元丰之间，中外府库，无不充衍，小邑所积钱米，亦不减二十万”，但济困助贫、减轻百姓负担目标并未达成。再看强兵，熙宁年间，宋军在内外战场均迎来久违的胜利。书中引用清人颜元的评价：“从治国与治兵，即富国与强兵来衡量，王安石变法成效明显，宋朝几乎要振兴了。”书中最后一节还引用漆侠《王安



石变法》的评价：“如果说，宋代的社会生产，在整个封建时代居于两个马鞍形的最高峰，你就应当说，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社会生产，则居于这个最高峰的最高点。”

但是宋朝并未真正实现振兴。由于神宗轻敌，宋军在对西夏战争中连遇两次大败，而西夏未灭，神宗就抱憾离世，高太后垂帘听政、哲宗即位后，重新启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司马光为相，新法废除，王安石十六年的变法成果付诸东流。此后，虽然南宋王朝在对王安石变法取舍上有所反复，但总体上宋史对王安石持否定态度，认为：王安石刚愎自用，不近人情，生财主义，变乱祖宗法度，以致国家败亡。对王安石变法的负面评价直到明代中期才开始改观。再到清末，一批维新人士重新发现王安石的变法遗产，将其视为改革先驱，如龚自珍、梁启超、严复等。梁启超认为：“王安石为盖世英雄，却一直蒙天下之垢，

可见国素来苟且，不恤国事，遂使千年如长夜。要早结束这漫漫长夜，就应当弘扬王安石的改革创新精神。”作者在肯定王安石变法成绩的同时，也评述了其变法的不合实际之处，如灵活性不足，用人失策等。

国际视野里的王安石变法

这本书读起来最有趣味的部分，是作者引用海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。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居然与中国官员学者大谈王安石，还要寻找王安石后人。书中描述：“华莱士在罗斯福新政中，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，实施农业贷款，建立常平仓，收购多余物资和食品，免费分发给市民，不但解决了荒荒问题，还确保了粮食物资价格的稳定，为美国渡过经济大萧条做出了贡献。”缘起是中国清末学者陈焕章，一

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，其论著《孔门理财学》介绍了王安石变法，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：孔子和儒家赞同的是一种有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。基于政府干预能抑制垄断，减轻民众负担的角度，陈焕章对于王安石变法给予了肯定。他说：“王安石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，但他却生不逢时。如果王安石的全部计划得以贯彻施行，那么，中国早在一千多年前便应当是一个现代国家了。”

作者推论：“事实上，凯恩斯革命的核心——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，早在二十五年前就被陈焕章提出过了。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测，凯恩斯受到了陈焕章及其《孔门理财学》的影响，正如华莱士受到了王安石的影响。”这个推测的确有些大胆，一个博士生的学位论文，是否能够影响凯恩斯这样大牌经济学家的思想，的确需找到更确凿的证据，才可作此结论。但华莱士本人对王安石的认同追寻，也足以说明王安石变法对当今世界的思想价值。

王安石变法的启示

读史是为了鉴今，《当改革遇见王安石》这是一个很妙的书名，意味着改革这个话题将是这本书的着力点。书中最后一节，在对王安石变法做了全面的评述后，有一段对全球大变革的评述：“若放眼世界，自十四世纪以来，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三百年后，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工业革命、俄罗斯改革、明治维新，以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、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、俄国十月革命，等等，变革席卷世界。今天以及可预见的将来，变革将引领潮流。王安石变法体现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方位感与方向性，他与宋代社会的变革同步共振，与数百年后乃至当今追求变革的时代精神、世界潮流不谋而合。”

陈胜利先生的文笔凝练生动，亦文亦白，评叙夹杂，虽是白话宋史和王安石变法历史大事件，但以一一篇篇短文，分述该时期的不同人物，不同事件。让我们读起来比较轻松，一些晦涩的引文，配以解读，加上一些白描式细节再现，让这种历史读物有了故事性和人物画像感，从而有了阅读的快感和引发思考的厚重。